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3.01.001

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经验研究

余静文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2007年重庆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推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户籍制度、地票制度、“三权”抵押融资等改革措施,有效促进了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利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没有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2011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的降幅为12.7%,而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实际降幅为21.8%,即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使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多下降了0.37。可见,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通过促进资源自由流动提高了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对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资源错配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破除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统筹城乡改革;合成控制法;城乡居民收入比;资源错配;资源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地票制度;土地流转;“三权”抵押

中图分类号:F061.3;F120.3;F127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01-10

一、引言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①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其原因在于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收入差距较强的解释力度。2007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之比为32.8,全国基尼系数高达0.53(李实等,2011)^②,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现有研

究,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收入差距增加的贡献最大(陈宗胜等,2002);如果使用Teil指数分解,那么1995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解释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34.2%(李实等,1998)。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解决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重要途径。

图1为1992年至2011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图,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

* 收稿日期:2012-11-26;修回日期:2012-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74)

作者简介:余静文(1983—),男,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博士,2009年赴美国纽约大学研修,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任教,主要从事融资约束、中国经济研究;Email:yujingwenpku@gmail.com。

①与蔡昉(2003)、陆铭等(2004)、周端明等(2008)、陈安平(2010)等文献一样,本文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定义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

②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5意味着收入差距悬殊。

居民纯收入在这段时间都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总体而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要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上升幅度。从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来看,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加,从1992年的1242.61元上升到2011年的14833元;从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来看,1992—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58上升到3.13。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1994至1997年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下降之后便开始了其上升的过程;在2009年之后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直到2011年依然没有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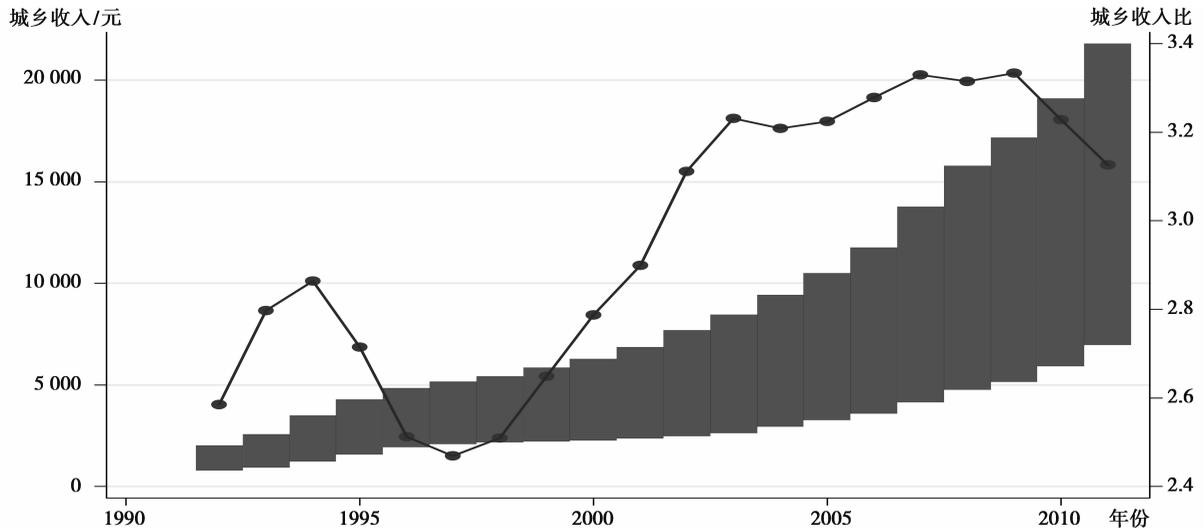


图1 1992—2011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注:阴影部分下限为农村居民收入,上限为城市居民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有其根本性的原因,比如,由于城乡不同生产方式导致的城乡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以及人力资本的差异(周端明等,2008)。除此之外,通常认为城市偏向政策、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经济开放等因素也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

城市偏向政策^①往往以农业的损害为代价来支持城市的发展。中国所实施的城市化、工业化偏向的政策在实现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收入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Lipton,1977;林毅夫等,1994;蔡昉,2003)。城市偏向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便是金融发展的二元结构,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注重金融发展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Burgess等(2005)、Clarke等(2006)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有利于基尼系数的下降。然而这些研究的背景与中国

的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比如,Burgess等(2005)得出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是建立在印度政府大力提倡和发展农村银行支行这一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金融发展在其语境中是指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相反,中国的金融发展存在“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农村金融抑制和城市金融深化同时存在,金融资源在农村地区的稀缺和低效率阻碍着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因此,对于中国而言,金融发展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孙永强等(2011)、叶志强等(2011)的经验研究均对此进行了证实。

同时,经济开放也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了影响。根据Stolper-Samuelson定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一国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需求增加导致要素需求增加,从而使得该国相

^① 在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政府通常会采取城市化、工业化偏向的政策,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种选择。这种发展战略的具体措施包括农业税、工农产品剪刀差、金融抑制等,扭曲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从而形成了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升;反之,该国进口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需求下降导致该类要素价格下降。对于中国而言,非熟练劳动力相对比较丰富,而这部分劳动力也主要是在城务工人员,因此,可以认为对外开放有助于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然而,现实中,对外开放也使得本国企业可以得到更先进的技术并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使产品技术含量有所提高,对熟练劳动力需求也会增加(Panagariya,2000),这反而不利于非熟练劳动力就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孙永强等,2011)。同时,中国还处于结构转型之中,传统农业部门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力,按照Lewis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农业部门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劳动力工资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进而导致中国出口贸易表现出显著的低工资增长、加工贸易为主的扩张特征,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有抑制作用(包群等,2010)。

此外,蔡昉(2003)和林贤彬(2004)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他们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是国家资源、社会机会、基本权利和发展空间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非对等的配置导致的,这种特别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社会等级关系,比如,城市阶层在政治上有过大的影响力,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对于政策影响力却很小;进而导致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国家采取的扶强扶优政策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将从资源错配的角度来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资源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生产效

率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资源错配的根源便在于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比如二元经济结构和制度限制和阻碍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然而如何定量分析限制资源自由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经验数据的缺乏以及分析方法的缺陷,一直都是研究的空白。

2007年6月,国家将重庆和成都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目的便在于在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自由流转上进行开拓和创新,找出合适的方式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作为“中国的一个缩影”的重庆^①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来进行户籍制度、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方面的改革,较其他省区更为有力地促进了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自由流动,并经过5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试点改革,使重庆的资源流动情况不但在改革前后产生了显著差别,也使其与其他省区产生了明显区别^②,这就为我们定量研究资源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经验材料。本文将使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一种新方法——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③来研究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进行量化,以明确重庆所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是否有效缩小了其城乡差距?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城乡差距的缩小?

二、重庆试点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

2007年6月,国家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④,其目的便在于从制度和体制上进行创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促进

① 重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小城市与大城市、大工业与小农业共存。2007年6月,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汪洋便表示“重庆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重庆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中创出一条新路,将对全局具有推动意义和典型示范意义。”

② 本文未选择成都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成都只是省会城市,不适合进行省区间的比较分析。

③ 合成控制法可以从数据自身出发,挖掘数据中隐藏的信息以赋予比较组对象适当的权重,利用这些权重得到一个在处置发生前与处置组拟合最好的比较组。Abadie等(2010)还提出了对合成控制法估计的结果进行统计推断的方法。合成控制法的优势之一在于利用现有数据将潜在的诸多控制组合成为一个控制组,下文将对该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④ 重庆市和成都市的改革试验区与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特区相比,存在三点区别:第一,试验区建立的体制背景不同。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特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重庆和成都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日趋完善背景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第二,试验区建立的目的不同。深圳等特区的建立目的是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并没有涉及“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重庆和成都则主要在于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第三,试验内容不同。深圳特区在于采取诸多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的流入,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此来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而重庆和成都则是利用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来发展农业经济、转移农村劳动力,为城乡协调发展创造环境(廖元和,2007)。

城乡协调发展。其中的一向主要内容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提升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①。土地流转意味着土地可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经营管理者处,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获得土地经营的规模效益。通过依法土地流转,农民不仅仅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租金、股红等直接收益,还可以通过转移就业实现薪金和二、三产业经营收入等。

经过五年多的改革实践,重庆市在户籍制度改革、地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要素流转的制度障碍。具体而言,改革试验区成立以来,重庆建立了地票交易制度: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并面向社会公开交易。地票制度实现了市域内大范围、远距离用地置换,提升了远郊区县农村宅基地价值,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户进城提供利益补偿机制;另外,地票收益也成为农民新居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宅基地通过地票变现也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在土地确权和

流转的背景下,重庆市还开展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出台了针对“三权”抵押融资的《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创新的意见》及实施细则,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框架体系和保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融资难问题。

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为重庆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重庆 GDP 总量从 2007 年前的 3 452.14 亿元上升到 2011 年的 10 011.13 亿元,增幅达到了 142.84%;人均 GDP 也从 12 316 元上升到 34 500 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 2007 年前的 4.03:1 下降到 2011 年的 3.15:1,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13:1)较为接近,这段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降幅为 21.8%。从全国层面来看,2007—2011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均值与 1992—2006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均值之比小于 1 的省区只有西藏、新疆、四川、云南和重庆,也就是说,2007 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有所减小的省区只有西藏、新疆、四川、云南和重庆(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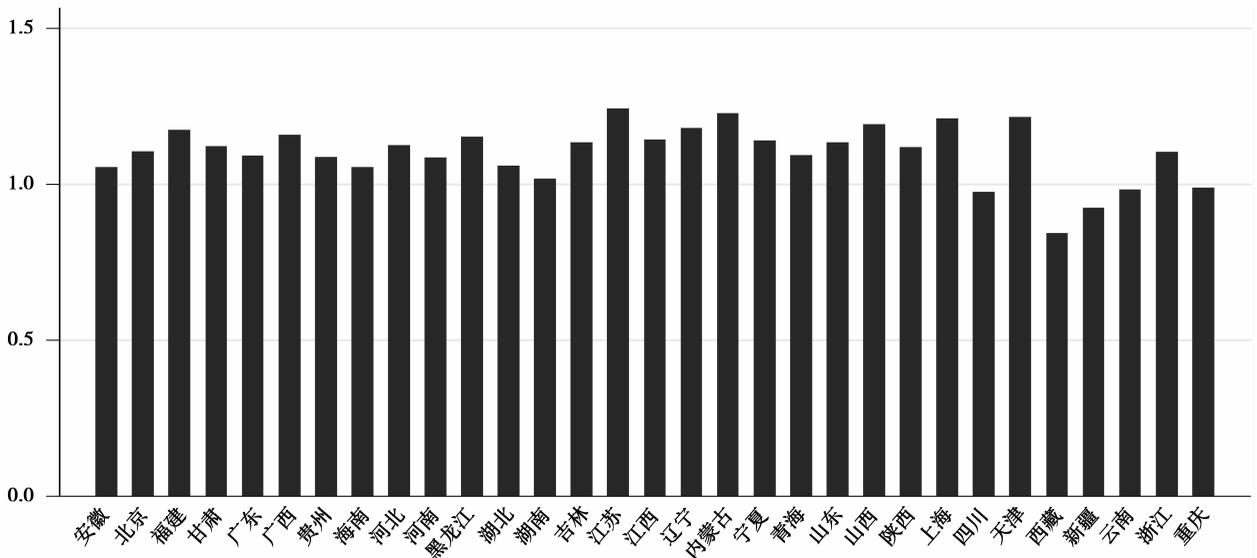


图 2 2007 年前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较

三、分析方法

由于国家在 2007 年将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因此,我们可以将 2007 年以后的重庆作为处置组(Treatment Group)。此外,

^① 到 2012 年,重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一圈”要达到 30% 以上,“两翼”要达到 20% 以上。其中,“一圈”即“重庆一小时经济圈”,“两翼”是指渝东北地区(即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地区(即原黔江地区)。

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个比较组。一个自然的选择,便是在中国其它省级区域中寻找合适的比较组,然后使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的方法,对比2007年前后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它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差,便可以得到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对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然而,由于其他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潜力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方面与重庆存在差异,将其作为重庆的比较组可能并不适合。

针对该问题,Abadie等(2003)和Abadie等(2010)提出了合成控制法,该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双重差分法估计产生的这种问题;王贤彬等(2010)和余静文等(2011)都使用合成控制法研究了中国的相关经济问题。合成控制法的基本特征是使用数据驱动的方法估算比较组的权重,按照处置之前的预测变量来测算比较组和处置组的相似性,由此合成一个可以与处置组在经济基本上相匹配的合成组。以下将简单介绍合成控制法的基本原理。

假设个体数量为 $J+1$,其中只有个体1在 T_0 时刻以后受到了处置,这表明,其它 J 个体可以作为个体1的潜在比较组,令 Y_{it}^N 表示个体 i 在时间 t 时没有接受处置时的值; Y'_{it} 表示个体 i 在时间 t 接受处置时的值。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Y_{it}^N + \alpha_{it} D_{it} \quad (1)$$

$$\text{其中 } D_{it} = \begin{cases} 1 & i=1 \text{ 且 } t > T_0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当 α_{it} 为1时,个体接受处置,当 α_{it} 为0时,个体没有接受处置。我们的目的就是估计当 $t > T_0$ 时, α_{it} 的值。由于 $t > T_0$ 时, Y'_{it} 是可以观察到的,而作为“反事实”的变量(Counterfactual Variable) Y_{it}^N 是不能被观察到的,因此比较案例研究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构造“反事实”的变量。此时,我们假设:

$$Y_{it}^N = \delta_i + \theta_i Z_i + \lambda_i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2)式中 Z_i 是不受到处置影响的控制变量,我们的目的便是估计权重 $W = (w_2, \dots, w_{J+1})'$,所有的权重均标准化处理,权重值均大于0,并且其和为1。

$$\sum_{j=2}^{J+1} w_j Y_{jt} = \delta_i + \theta_i \sum_{j=2}^{J+1} w_j Z_j + \lambda_i \sum_{j=2}^{J+1} w_j \mu_j + \sum_{j=2}^{J+1} w_j \varepsilon_{jt} \quad (3)$$

假设存在 $(w_2^*, \dots, w_{J+1}^*)$ 使得下式成立^①:

$$\sum_{j=2}^{J+1} w_j^* Y_{j1} = Y_{11}, \dots, \sum_{j=2}^{J+1} w_j^* Y_{jT_0} = Y_{1T_0} \quad (4)$$

$$\sum_{j=2}^{J+1} w_j^* Z_j = Z_1 \quad (5)$$

如果 $\sum_{t=1}^{T_0} \lambda_t' \lambda_t$ 为非奇异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下式:

$$Y_{1t}^N - \sum_{j=2}^{J+1} w_j^* Y_{jt} = \sum_{j=2}^{J+1} w_j^* \sum_{s=1}^{T_0} \lambda_s' (\sum_{n=1}^{T_0} \lambda_n' \lambda_n) \lambda_s' (\varepsilon_{js} - \varepsilon_{1s}) - \sum_{j=2}^{J+1} w_j^* (\varepsilon_{jt} - \varepsilon_{1t}) \quad (6)$$

Abadie等(2010)证明在一般条件下,式(6)的右端会接近于0,此时, $\sum_{j=2}^{J+1} w_j^* Y_{jt}^N$ 便成为 Y_{1t}^N 的无偏估计。当 $t \geq T_0$ 时,我们无法观察到 Y_{1t}^N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 Y_{1t}^N 的无偏估计 $\sum_{j=2}^{J+1} w_j^* Y_{jt}^N$,进而便可以估计出 $t \in \{T_0 + 1, \dots, T\}$ 时的处置效应^②:

$$\tilde{\alpha}_{1t} = Y_{1t} - \sum_{j=2}^{J+1} w_j^* Y_{jt} \quad (7)$$

四、实证分析

1. 数据说明和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的数据来自于2011年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表示,记为 Gap 。考虑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的政策不稳定性和改革思路的不确定性,我们将数据范围确定在1992—2011年;将1992—2006年作为拟合预测变量的时间段,处置组

^① $(w_2^*, \dots, w_{J+1}^*)$ 通过最小化 $\|X_1 - X_0 W\|_V = \sqrt{(X_1 - X_0 W)' V (X_1 - X_0 W)}$ 求出,其中 X 表示预测变量, Y 为对称的正半定矩阵,详见Abadie等(2003)附录B。

^② 关于合成控制法的技术细节详见Abadie等(2010)附录B。

为重庆市,潜在比较组为除重庆市以外的其它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本文选择的预测变量包括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诸多因素:(1)经济开放度,用 *FDI* 占 *GDP* 比重以及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来衡量;(2)金融发展和深化指标,用贷款余额占 *GDP* 比重来衡量;(3)影响人力资本的政府教育投入以及教育质量,其中政府教育投入用小学在校生比例和大学在校生比例来衡量,教育质量用小学师生比和大学师生比来衡量。此外,我们也将第二产业所占比例、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邓小平南巡的 1992 年、汇率并轨的 1994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 1997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 2002 年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 2006 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预测变量。

表 1 为重庆市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在我们所考察的 20 年间,重庆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为 3.44,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曾达到 4.026,最小也为 3.022。表 2 为预测变量的比较,从表 2 我们可以看出重庆市的预测变量与合成重庆市的预测变量的差距基本都要小于重庆市预测变量与全国预测变量的差距。并且 1992 年、1994 年、1997 年、2002 年和 2006 年的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合成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拟合得较好。这表明根据合成控制法估算的权重对比较组进行合成可以很好地拟合重庆市的特征,进而也可以较好地模拟出 2007 年之后重庆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表 1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重庆市)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i>Gap</i>	3.440	0.244	3.022	4.026	20
<i>Open</i>	0.106	0.029	0.059	0.187	20
<i>FDI/GDP</i>	0.025	0.017	0.011	0.067	20
<i>In2GDP</i>	0.430	0.055	0.385	0.554	20
<i>In3GDP</i>	0.395	0.046	0.322	0.453	20
<i>LoanGDP</i>	1.093	0.204	0.743	1.388	20
<i>Edup</i>	0.044	0.010	0.009	0.063	20
<i>Edus</i>	0.090	0.033	0.056	0.161	20
<i>Stupper</i>	0.080	0.010	0.067	0.100	20
<i>Stusper</i>	0.009	0.006	0.002	0.020	20

表 2 预测变量的均值

变量	重庆	全国	合成的重庆
<i>Open</i>	0.099	0.431	0.178
<i>FDIGDP</i>	0.019	0.039	0.051
<i>In2GDP</i>	0.402	0.463	0.333
<i>In3GDP</i>	0.398	0.372	0.381
<i>LoanGDP</i>	1.021	1.004	1.131
<i>Edup</i>	0.043	0.046	0.041
<i>Edus</i>	0.096	0.105	0.109
<i>Stupper</i>	0.095	0.102	0.134
<i>Stusper</i>	0.006	0.005	0.004
<i>Gap(1992)</i>	3.241	2.585	3.271
<i>Gap(1994)</i>	3.569	2.863	3.673
<i>Gap(1997)</i>	3.133	2.469	3.129
<i>Gap(2002)</i>	3.451	3.111	3.532
<i>Gap(2006)</i>	3.905	3.278	4.026

2. 实证结果

通过合成控制法,我们进行 31 次估计,每一次均将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处置组,将其它地区作为潜在的比较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图 3。图 3 的纵坐标表示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合成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差,其中,带有三角符号的曲线代表重庆市的估计值。以重庆市作为处置组进行估计的权重矩阵见表 3,在所有的权重中,贵州省所占权重最大,为 0.552;其次是海南省,为 0.362;再次为云南省、安徽省和湖南省,分别为 0.041、0.027 和 0.017,其它地区权重均为 0。这说明贵州省、海南省、云南省、安徽省和湖南省的加权能够很好地拟合 2007 年之前重庆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我们可以按照合成控制法将这五省的加权平均作为重庆市的比较组,以此来分析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从图 3,我们可以看出在 2007 年之前,处置组和合成组的拟合程度相对较高。从 2007 年开始,我们发现重庆市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合成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实际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小于合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表明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所进行的改革使得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显著下降。估计结果表明,如果没有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那么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从2007年前的4.03下降到2011年的3.52,降幅为

12.7%;然而,2011年重庆市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下降到了3.15,降幅高达21.8%。可见,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和改革试点使得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多下降了0.37;相比合成组3.52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11年重庆实际城乡收入差距的降幅达到了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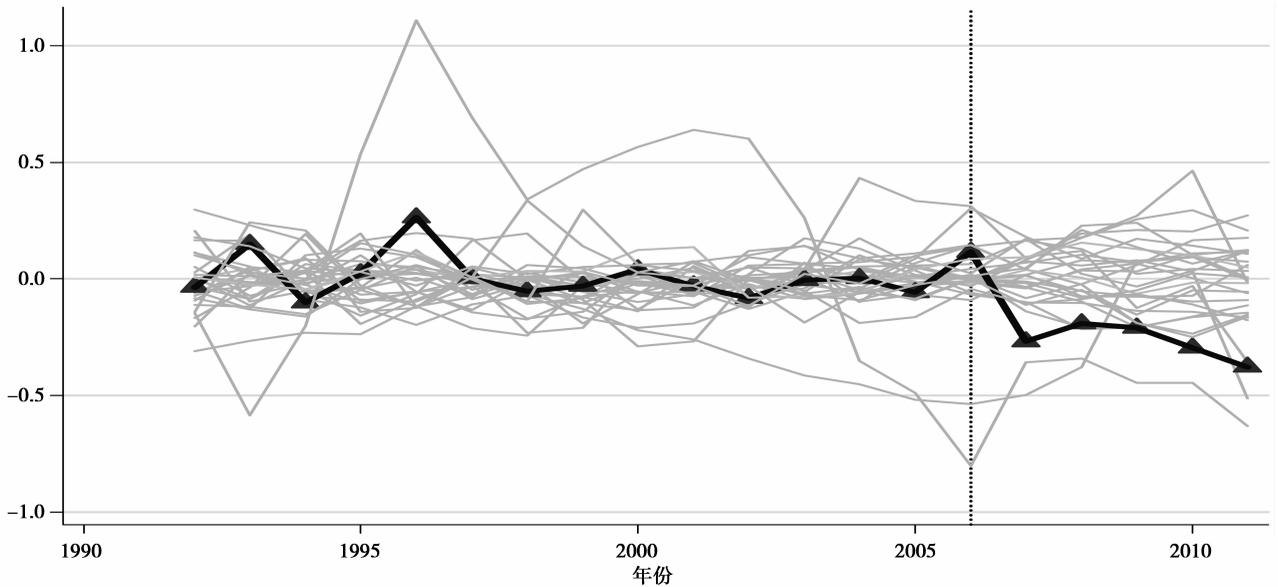


图3 处置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合成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差(31个省区)

表3 潜在比较组的权重

省份	权重	省份	权重	省份	权重
北京	0	浙江	0	福建	0
天津	0	安徽	0.027	四川	0
河北	0	江西	0	贵州	0.552
山西	0	山东	0	云南	0.041
内蒙古	0	河南	0	西藏	0
辽宁	0	湖北	0	陕西	0
吉林	0	湖南	0.017	甘肃	0
黑龙江	0	广东	0	青海	0
上海	0	广西	0	宁夏	0
江苏	0	海南	0.362	新疆	0

3. 稳健性检验

在比较案例研究中,经常采用的稳健性检验为排序检验方法(Permutation Test)(Abadie et al,

2010),在此也运用排序检验方法的对前文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从图3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重庆市,其它的一些省份在2007年之后也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于合成组缩小或者扩大的情况,那么,重庆市所表现出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是不是就是因为其改革导致的呢?换言之,前文估计的结果是否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从图3中,我们可以发现合成控制法估算的权重对重庆市2007年之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拟合较好。当然,我们也发现2007年之前某些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能很好地由其它省份的加权平均来合成。对于处置组而言,如果2007年之前合成组的拟合情况较差,那说明2007年之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合成组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差可能是比较组的线性组合自身所产生的误差导致的。因此,我们删除掉2007年前均方预测误差(Mean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 MSPE)大于0.01的个体,得到21个省区:北京、河北、山西、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甘肃、青海和宁夏。

将重庆市以及潜在比较组集合中的 20 个地区分别作为处置组,使用合成控制法进行估计,结果见图 4。可以发现重庆市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合成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差向下变动幅度最大,

受到的负向影响也最大。那么这也表明在随机排列中,只有 1/21,即 4.8% 的概率出现重庆市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合成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这类似于传统统计推断的显著性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4.8%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改革没有对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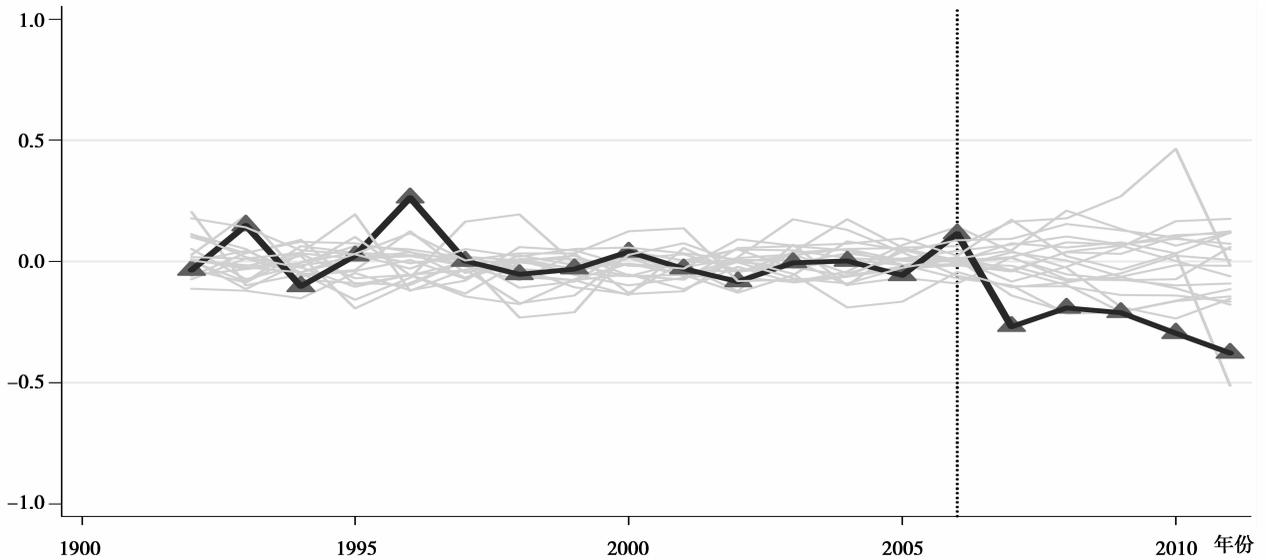


图 4 处置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合成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差(21 个省区, MSPE <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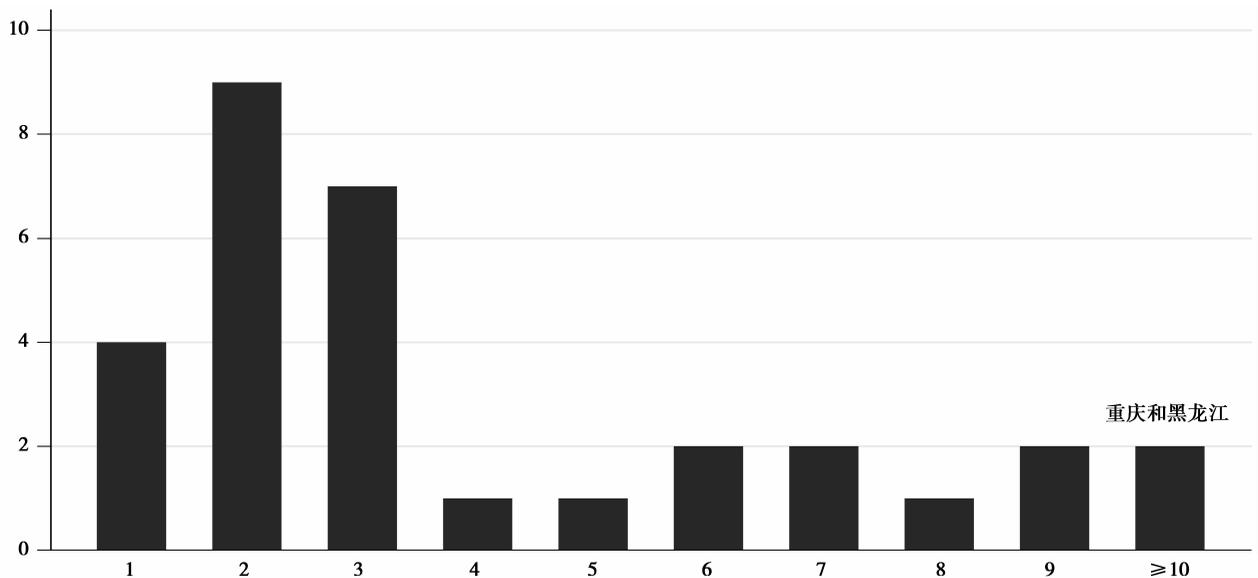


图 5 2007 年之后与 2007 年之前 MPSE 比值的分布

此外,我们还计算了 2007 年之后和之前 MSPE 的比值,考察这一比值的分布。2007 年前的 MPSE

越小表示合成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拟合越好,而 2007 年后的 MSPE 越大则

表示受改革影响越大。我们预期,如果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确受到了改革影响,并且这一影响是显著的,那么2007年之后产生的MPSE与2007年之前产生的MSPE的比值应当是较大的。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不用人为地选择MSPE的值来剔除样本。通过计算所有样本MSPE的比值,我们发现重庆市和黑龙江省的MSPE比值最高(图5)。如果随机使一个地区成为处置组,那么要获得和重庆市一样高的MSPE比值的概率是2/31,即6.5%,这表示我们可以在6.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统筹城乡改革没有对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假设。

根据以上两个稳健性检验,按照排序检验方法,拒绝原假设的显著性水平在5%左右,估计结果的显著性是较高的。综合以上稳健性检验,我们可以认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即重庆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有效降低了其城乡收入差距,重庆市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五、简要结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那么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从2007年的4.03下降到2011年的3.52,降幅为12.7%;然而,2011年重庆市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了3.15,降幅高达21.8%。也就是说,重庆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使得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比多下降了0.37,降幅达到10.5%(相比于合成组的城乡居民收入比3.52)。而2007年后重庆的统筹城乡改革,主要在户籍制度、土地确权和流转以及“三权”抵押融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改革有效促进了生产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可见,要素资源流转过过程便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也会提高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进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为了缓解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逐渐扩大的趋势,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而重庆市的案例表明,破除对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缓解和消除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改善原有的资源错配状况,

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增加,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包群,邵敏. 2010. 出口贸易与我国的工资增长: 一个经验分析[J]. 管理世界(9):55-66.
- 蔡昉. 2003. 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 中国社会科学(5):16-25.
- 陈安平,杜金沛. 2010. 中国的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统计研究(11):34-49.
- 陈宗胜,周云波. 2002. 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黄益平,陶坤玉. 2011. 中国外部失衡的原因与对策:要素市场扭曲的角色[J]. 新金融(6):7-13.
- 李实,罗楚亮. 2011. 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J]. 经济研究(4):68-78.
- 李实,赵人伟,张平. 1998. 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J]. 经济研究(4):42-51.
- 廖元和. 2007. 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背景与战略思路[J]. 开放导报(4):39-41.
- 林光彬. 2004. 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 管理世界(4):30-40.
-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4.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陆铭,陈钊. 2004.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6):50-58.
- 孙永强,万玉林. 2011. 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1):28-39.
- 王贤彬,聂海峰. 2010. 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4):42-53.
- 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 2011. 金融发展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 金融研究(2):42-56.
- 余静文,王春超. 2011. 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J]. 南方经济(4):30-39.
- 周端明,蔡敏. 2008.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述评[J]. 中国农村观察(3):66-74.
- ABADIE A, DIAMOND A, HAINMUELLER J. 2010.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for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alifornia's Tobacco Control Program[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5(409):493-505.
- ABADIE A, GARDEAZABAL J. 2003.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113-132.

- BURGESS R, PANDE R. 2005.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3):780-795.
- CLARKE G, XU L, ZOU H. 2006.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What Do the Data Tell Us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2(3):578-596.
- LIPTON M.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M].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NAGARIYA A. 2000. Preferential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and New Developmen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2):287-331.
- SONG Z, STORESLETTEN K, ZILIBOTTI F. 2011. Growing like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1):196-233.

Does Chongqing's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form Shrink the Incom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YU Jing-we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Chongqing was defined as China's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form pilot zone in 2007, Chongqing conducted many reforms i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among which the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reform, securitized land system, "three-right" collateral and so o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labor force, land and capital and so 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form pilot zone on the gap of the incom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re is not the pilot zone, the decrease ratio of urban resident income to rural resident income is 12.7 percent, however, the real decrease ratio of urban resident income to rural resident income is 21.8 percent, Chongqing's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form made the ratio decrease 0.37 more. As a result, after the set-up of the pilot zone in Chongqing, Chongqing's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form raises relative incom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through boosting resources free-flow and has active influence on shrink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us, one of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and enlargement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f China is mis-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lifting of the restriction on free-flow of resources can effectively shrink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 realiz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form;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ratio of urban residents income to rural residents income; mis-location of resources; free flow of resources;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reform; securitized land system; land transfer; "three-right" collateral

CLC number: F127719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3)01-0001-10

(编辑:夏冬)